

WENSHI ZHISHI

文史知识

12

自学答问

胡适与「红学」

沈家本与《历代刑法考》

古代的巫术与迷信犯罪

「虾蟆天子」——朱由崧

近十年孔尚任及《桃花扇》研究综述

卞孝萱

吕启祥

崔文印

殷啸虎

卢兴轩

朱万曙

1990



医药学院610 2 01472145

文史知识

1990年第12期
(总第114期)

-
- 治学之道 • 自学答问 卞孝萱 3
-
- 文学史百题 • “等为梦境，何处生天”
——《南柯梦》《邯郸梦》荒诞意识谈 郭英德 9
-
- 历史百题 • 沈家本与中国近代法制 梁治平 16
-
- 胡适 胡适与“红学” 吕启祥 24
研究 从“整理国故”看胡适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李占领 31
专题 大陆胡适研究十年述评 雷颐 37
-
- 诗文欣赏 •
含蓄 王明居 43
长江儿女之歌——崔颢《长干行》欣赏 李家骥 46
说辛弃疾《永遇乐·北固亭怀古》 黄瑞云 49
-
- 武侠小说漫话 • 豪侠世界品柔情 罗立群 51
-
- 文史书目答问 • 沈家本与《历代刑法考》 崔文印 57
-
- 文化 说“腊” 张恬 61
史 漫话古代的足球 张爽 63
知识 古代的巫术与迷信犯罪 殷啸虎 68
-
- 古代心理诗学(6) •
有所“吐”才能有所“纳”
——“才、胆、识、力”作为诗人的心理结构 童庆炳 72
-
- 汉魏女性的爱情婚姻理想 黄仕忠 78
-

人物 春秋	唐代英儒第一家	
	——经学大师孔颖达其人其学	李建国 84
	“虾蟆天子”——朱由崧	卢兴轩 90

• 文学人物画廊 •

“作好作恶者皆龙友也”	孔 瑾 94
——谈谈《桃花扇》中的杨文骢	

• 文史信箱 • “江湖诗祸”的产生及其影响	张宏生 99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• 文史研究动态 •

近十年孔尚任及《桃花扇》研究综述	朱万曙 103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• 读者 • 作者 • 编者 •

“台湾专号”正误	〔台〕叶大沛 109
情如磐石心自坚——读“台湾专号”	王向东 112

文 史 信 息	汉代的博士家法与师法 (15)	原始巫术与中国远古情
	歌 (42)	“小谢”并非指谢朓 (48)
	关中好利民风的兴	
	衰 (60)	《陕西通史》编纂工作全面展开 (109)
	西汉散	文的特色 (127)

书 评	可贵的开拓 有益的探索	孙 静 114
	——读《中国文学概论》	

《文史知识》1990年总目	118
---------------	-----

• 补白 6 则 •

中国古代的妇妒 (23)	哭母不哀 (50)	伤春与悲秋
(56)	玉石之路 (113)	买鳖亡鳖 (116)
(117)	“衙门”小释	

虎丘剑池 (封二)	唐诗画意 (封三)
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自 学 答 问

卞孝萱



卞孝萱，江苏省扬州市人，1924年生，自学成家。现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、中国唐史学会理事、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、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会长等。主要著作有《刘禹锡年谱》、《元稹年谱》、《唐代文史论丛》、《刘禹锡丛考》、《刘禹锡研究》（与屈守元合撰）等，发表论文一百余篇，主编《中国文学史大词典·唐五代卷》。

问：听说您是自学成家的，能对我们谈谈您是怎样走上自学之路的吗？

答：我是自学，但未成家。历史文化名城扬州是我的故乡。我在北柳巷读小学，校址是“董子祠”，当时董仲舒的塑像犹存。“大儒坊”在我家附近，“大儒”指西汉江都相董仲舒。传说是隋、唐注《文选》的地方——“古文选里”也离我家不远。我在大汪边读中学，从我家到学校，经过“太傅街”阮元故居，这条街以阮元官太子太傅命名。中学的同学中，有汪中的后裔，我喜欢到他家玩，听他的父亲讲些汪中的佚事。从汉代大儒董仲舒，到隋、唐“选学”大师曹宪、李善，到清代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阮元、汪中，都在我的幼稚的心灵上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我也要做有学问的人，才有意义：这个朴素的信念从那时起便开始在我的头脑中萌生了。由孤儿苦学终成大家的汪中，尤为我所向往。由于经济条件的限

制，我不能享受正规的高等教育，自然而然地走上自学之路。

问：自学之艰苦，是不言而喻的，什么是您不畏艰苦的精神支柱呢？

答：我出生不到两个月，父亲便去世了，我与十九岁的寡母相依为命。靠变卖古董、亲友援助、母亲替邻居做针线的收入，维持生活。我五岁时（1928），想念书。母亲每天先向邻居学会几个字，回家教我和附近的一些贫儿。曾有几十位前辈为此事作画赋诗填词，这里举柳亚子先生的作品为例。柳先生赠诗两首，第一首是：“教儿先就学，即学即传人，此是弥天愿，宁关一室春。”这种“即学即传人”的教学法，南京大学陈中凡教授认为与教育家陶行知所推行的“小先生制”不谋而合，撰文表彰。母亲以一个二十三岁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，开始认字教人，这种精神在激励、鞭策着我，使我终身对学业不敢有丝毫懈怠。

问：我们想听您谈谈自学的经过，好吗？

答：抗日战争时期，沦陷区社会动荡，物价飞涨，生活艰难。我十八岁便独自到上海银行界谋生。因黄炎培的提倡，当时上海的职业教育比较发达。我白天在银行工作，晚间进夜校补习。开始学的很杂，后来兴趣集中到文史方面。我家虽衰落，但还是“书香门第”，故旧中不乏学者。我感到夜校传授的知识远远不够用，便进一步向学者求教。我国知识界有诲人不倦的优良传统，对于自学孤儿的求教，一般是不忍拒之于门外的。即使是随便闲谈，我也能从中领悟到一些道理。由于没有固定的老师，也就养成我不囿于一家之言，“转益多师”、博采众长的习惯。

问：您是怎样成为范文澜先生写《中国通史简编》的助手的？

答：1949年以前，我向学者求教时，得知碑（墓碑、墓志铭）传（行状、家传）素为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。宋代以来，碑传编纂盛行，至清代，达到高潮。我在图书馆中读钱仪吉《碑传集》、缪荃孙《续碑传集》、闵尔昌《碑传集补》（汪兆镛《碑传集三编》当时尚未出版），感到清代名人碑传已辑录得相当齐备，而清以后尚缺，于是立志收集辛亥革命时期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

化各方面重要人物的碑传。我在收集过程中感到，由于时代的变迁，私家采用“树碑立传”传统方式者日渐减少，辛亥时期这批碑传资料，可以说是中国史料学上碑传这一重要分支的绝响了。承许多名人的后裔，将他们家藏的碑传赠送或借抄，许多文人、书家，将他们所撰、所书的碑传稿本、拓片赠送或借抄，我也从新旧书店访购到不少辛亥人物的碑传。日积月累，达两大箱。1949年后，我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，陈垣先生为我题写《广碑传集》书签，金毓黻先生将我推荐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。进所后不久，廖承范文澜先生青睐，命为助手。从为《中国通史简编》提供资料到撰写初稿，都是在范老的指导下边干边学。不是党的培养，前辈学人的帮助提携，像我这样的自学青年，是很难进入科研单位的。

问：章士钊先生为什么邀请您为他校订《柳文指要》？

答：章士钊先生是逻辑学家，他因柳宗元的文章逻辑性强，特别爱好，以毕生的研究，撰为《柳文指要》。六十年代，他已是八十——九十的高龄，仍然继续收集材料。他的秘书王益知经常到各图书馆查阅古籍；我与王秘书就是在图书馆里认识的。我是自学出身，对于求知之难，体会较深，推己及人，凡是别人找我解答问题，我总是尽力帮助。每当王秘书解决不了章老提出的难题而求助于我时，我都认真思考，详细解答，得到章老的信任，在《柳文指要》中多次引用我的研究成果。在该书出版前，章老写信给周总理，要我校订一下全稿。当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各所人员，都在河南干校。由于章老点名，周总理立即下令召我回京，在章老家中工作了一段时间，朝夕相处，使我获得亲炙的机会。该书出版后，章老送我一部，亲笔题识：“孝萱老棣指疵。此书出版，荷君襄校之力，甚为感谢。章士钊敬赠，一九七一年十月廿六日。”钤印二方。

问：自学成家的您，在文史研究方面最重要的心得是什么？

答：我进中国科学院之前，无固定的老师。进近代史研究所之后，师事范老，但仍保持着自学时期所养成的“转益多师”的习

惯，注意吸收其他前辈的特长。举例来说：1990年是陈垣先生诞生110周年，他的嫡传弟子刘乃和教授，特约我写一篇纪念文章，即因她知道我私淑陈老，有所领悟的缘故。章士钊先生在《柳文指要》下《二恨潜通史迹》里称赞我“如此觅证，在逻辑谓之钢叉论法，百不失一。孝萱既从联锁中获得良证，而吾于子厚所云外连强暴之一大疑团，立为销蚀无余，诚不得谓非一大快事”，其实这正可看作我吸取章老治学方法的一个具体收获。当然，范老对我的影响是最重要的。

范老善于用一两句通俗的语言，表达出高深的道理。他常说，治学要“天圆地方”。“天”指头脑，头脑“圆”，才灵活，能思考问题，如果“方”，就呆板，不会思考问题了。“地”指屁股，屁股“方”，才坐得住，能认真读书，如果“圆”，就滑了，坐不住了。他常说，治学要下“二冷”的决心。一是坐冷板凳，二是吃冷猪肉。意思是要踏踏实实地用功，不要汲汲于眼前的名利。特别需要提出的，是范老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“神似”，不要“貌似”，以及“专通坚虚”的四字诀。范老强调“专”，重视“通”。他常说，专而不通的人，好像坐在“禁闭室”里，是写不出好文章来的。范老主张，既要“坚”，又要“虚”，就是要在学术上真正做到坚持真理，修正错误，不人云亦云。这是范老从他一生的治学经验中总结出来的，我铭诸座右，终身不忘。

再说一点心得。自学的我，披荆斩棘，吃过不少苦，走过不少弯路，才摸索出一条适合于我走的道路。仅知“转益多师”而不懂得走自己的路，会茫无头绪，得不到归宿。

我自知笨，不善空谈，只有实干。我在学习中国古代史，主要是古代文化史的基础上，以唐代文史为主攻方向，遵照范老又专又通的教导，企图突破治文者不治史、治史者不治文的单一范围，开拓一个点面结合、文史结合的广阔领域。

唐代文学家，“刘柳”并称，“元白”齐名。但历来研究柳宗元、白居易者多，研究刘禹锡、元稹者少。为了填补这一空白，我选择刘、元为研究对象，撰写了《刘禹锡年谱》、《元稹年谱》，

这是点。我又对李益、张籍、王建、李绅、南卓等（与刘或元创作关系比较密切），考证生平，撰写年谱，这是面。由点到面，以避免孤立地研究刘、元之弊；再由面返回到点，以充实对刘、元的认识。我又写成《刘禹锡丛考》，考出刘禹锡交游近五百人，以对“永贞革新”的态度为分野，揭示刘禹锡与有关人士的亲疏、敌我关系，展现他鲜明的立场、强烈的爱憎、坚毅顽强的性格，有裨于知人论世。我接受《中国文学史大词典·唐五代卷》的主编任务，也可以看成是我对点面结合的治学方法的又一尝试。

中晚唐政治斗争错综复杂，史书往往语焉不详，而文学作品中有曲折的反映。我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历史背景以及传奇作者的政治立场入手，用文史结合的方法，对《任氏传》、《枕中记》、《南柯太守传》、《霍小玉传》、《上清传》、《辛公平上仙》的创作意图，进行了新的探索。其中《辛公平上仙》是影射唐顺宗被宦官杀害的观点，已为章老《柳文指要》、韩国磐教授《隋唐五代史纲》等书采用。现在我正扩大这方面的研究，承担国家教委博士点科研项目《中晚唐政治斗争与文学》课题。

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，怎样迈开第一步？科研的价值在于探索未知，除了系统、全面地掌握本专业已有的知识之外，要发掘新材料，提出新问题，得到新结论，而不囿于成说。我从明抄本《吟窗杂录》中辑出被人认为久已失传的《丹阳集》、《琉璃堂墨客图》残本。从医书中发现《唐刘禹锡纂柳州救三死方》记载着元和十一年（795）十月柳宗元“得干霍乱”，十二年“得疔疮”，又“得脚气，夜半痞绝，胁有块，大如石，且死，因大寒不知人三日，家大号哭”。从而对柳宗元贬谪柳州以后的不幸情况，有更多的了解。从张籍《逢王建有赠》“鹄山漳水每追随”诗句，考出张、王相识的时间、地点，至今为人袭用。从刘禹锡的诗文，考定他的籍贯和出生地，承刘大杰、钱仲联两教授在为《唐宋文举要》所写的《前言》中充分予以肯定。从元稹的诗文，揭示他的家庭真相、“变节”真相以及恋爱、婚姻等事的隐情，等等。

我国的文学史家较少运用统计方法，我曾在银行工作，熟谙

此道，在论证刘禹锡诗对晚唐诗人、苏轼、江西诗派的影响的三篇文章中，大量编制统计图表，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发挥自己优势吧？

我未申报过科研奖、著作奖，从不与人争名。最使我感动的是，我在《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》文中，提出新乐府运动是裴垍集团政治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对元和“中兴”起了积极作用的观点，被《文史知识》广大读者评选为十篇最爱读的文章之一。我服膺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中引用过的“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”：“走你的路，让人去说话！”

同学们：自学的我，事倍功半，感到惭愧。你们是博士生、硕士生，你们的学习环境，与我昔日的自学，有天渊之别。“劝君惜取少年时”，发奋图强，早日攀登科学高峰。

这篇《自学答问》是在《文史知识·治学之道》发表的，所以还要顺便说几句话。目前社会上有许多自学文史的有志青年，你们的学习条件，也比我昔日的自学条件好得多，《文史知识》是帮助你们自学的好刊物，谨在此祝你们成功。（杜炜尧等整理）

虎丘剑池（封二介绍）

虎丘剑池位于苏州城外七里处的虎丘山上。据《吴越春秋》、《越绝书》等古籍记载，吴王夫差将父亲阖闾安葬在这里，当时，为了修建陵墓，吴国征调了十万民工，并用大象运输各种材料，穿土凿池，积壤为丘，工程规模浩大。棺柩外用三重铜槨套裹，池中灌注水银，并陪葬了大量的黄金珍玉，还有扁诸、鱼肠等三千宝剑秘藏在幽宫深处。吴国灭亡后，越王勾践、秦始皇、东吴孙权都曾先后到这里来凿石探宝求剑，均无结果，据说，剑池因此而形成深池。虎丘并不是大山，但气势雄奇，特别是剑池裂崖如束，风生洞壑，身临其境，却有登高山、入深壑之感。

1512年（明正德六年），苏州大旱，剑池水涸竭，人们发现剑池北端有洞穴，估计为吴王墓室门，后又埋起来。1955年，为疏浚剑池，曾抽干池水，清除淤泥，池北露出上窄下宽的石穴，石穴长约10米，宽仅容一人，尽头处有巨石挡住去路。这些石头与虎丘山的岩石不一样，外形比较平整，显然是经过人工移入密封的。考古工作者认为，这种形制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洞室形制相像，似为阖闾之墓，因怕危及山顶的虎丘古塔，所以没有发掘。

「等为梦境，何处生天」

——《南柯梦》《邯郸梦》荒诞意识谈

· 文学史百题 ·

郭英德

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，真正表现荒诞意识的作品并不多。而明代文学家汤显祖的《南柯梦》和《邯郸梦》两部传奇（简称“二梦”），却继承和发扬了古代文学中的荒诞意识，鲜明强烈，引人注目。

《南柯梦》本事出唐人李公佐《南柯太守传》；《邯郸梦》本事据唐人沈既济《枕中记》。汤显祖虽然多有改编增饰之处，但却传承了原有故事的框架，以人物之梦为中心情节，通过“怪怪奇奇，莫可名状”的写梦手法，制造了令人目眩的梦幻效果。

《南柯梦》的主人公淳于棼无聊醉卧，酣然入梦，被迎接到槐安国，与公主成婚，治理南柯郡，入朝拜相，荒淫宫廷，最后被遣归家——醒来卧榻如初，窗下酒尚留余温。

《邯郸梦》写吕洞宾在邯郸赵州桥北的一个小饭店里度脱卢生，让他高枕瓷枕，沉睡入梦。梦中，卢生遍历了结婚、应试、治河、征西、蒙冤、贬谪、拜相、封公、病亡等一生宦海波澜、五十年人我是非，而一梦醒来，锅中黄粱尚未煮熟。

人生如梦，在中国古代是源远流长的人生哲学思想。早在战国时期庄子在“庄周梦蝶”的故事里，就以梦境与现实的或即或离状态来怀疑现实、人生乃至人的主体的实在性。从此，也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形成了一种传统，即以梦境与实境的对比，来观照现实社会的荒诞，透示人生自我的虚无，从而召唤精神幻想的永恒。这一传统，由于佛教的输入和禅宗的盛行，在中唐以后，对文人士大夫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于是在诗词、小说、戏曲中，人生如梦成为重要的文学主题。梦境的虚幻性、理想性和寓意性，既给人们以深刻的启发和强烈的警醒，也捎来了悠长深远的空幻感和虚无感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，《南柯梦》和《邯郸梦》也是人生

如梦的传统主题的变奏。

然而，《南柯梦》和《邯郸梦》的梦境描写，还仅仅是其荒诞意识的表层意蕴。实际上，汤显祖只是借助于梦境的外壳，来表达其对现实图景、人生状况和人性特征的独特感受和理解——这才是其荒诞意识的深层意蕴所在。

所谓“荒诞”，在汉语里，犹言荒唐，本意为漫无边际，后引申为虚妄不可信，如说话没有根据或行为不合情理就称为荒唐，或荒诞。但是当我们用“荒诞”来翻译英语absurd一词时，却另有别解。absurd一词，由拉丁文的surdus(耳聋)演变而来，在音乐中用来指不协调音，在哲学上指个人与其生存环境脱节，即自我与人生的缺乏意义。在这个哲学概念中，人既不是世界的主人，也不是社会的牺牲品；他对外部世界无法理解，他的任何行为和喜怒哀乐的感情对它都不起作用；世界只呈现冷漠、陌生的面孔。因而所谓荒诞意识，就是指这样一种哲学思想：认为世界是荒谬不可知的，命运是变幻无常的，人与人之间是无法沟通的，人的一切行为都是毫无意义的，如此等等。

那么，《南柯梦》与《邯郸梦》是怎样表现这样的荒诞意识的呢？

首先，汤显祖在“二梦”中展示了一幅荒谬绝伦的现实图景，这是一个几乎无法用传统的理性方法加以解释的世界。在这里，一切都是那么荒谬怪诞，然而又是那么冠冕堂皇；一切都是那么龌龊卑鄙，又是那么正大光明。真和假，善和恶，美和丑，仿佛可以随意倒置，就像变戏法一样。

《邯郸梦》里，婚姻犹如儿戏：破门而入的卢生，竟因情愿“私休”，由阶下之囚跃身为堂上娇客，与崔氏婚配。科举成为买卖：卢生在崔氏的鼓励下，进京赴考，“将金货广交朝贵，竦动了君王；在落卷中翻出做个第一”。胡行竟得成功：卢生对河工一窍不通，却不得不勉为其难地操办，用盐蒸醋煮的荒唐办法，居然破石开河，克奏奇功。官场倾轧、宦途升迁更如风云变幻，卢生忽而受宠，忽而遭贬，忽而勒石纪功，忽而绑赴云阳，忽而流

放边关，忽而位极人臣，尝尽了人情冷暖、世态炎凉。

《南柯记》里，淳于棼刚新婚公主，就无功受禄，被授为南柯太守。南柯治绩显著，官升左相，权盛一时。不料公主病歿，他的“裙带”一断，便颓然倒台了。“君心”翻覆，仕途沉浮，真如白云苍狗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上述这些情节，大多是唐人小说中未尝描写或甚为简略的。而汤显祖匠心独运，以形象的画面表达了对荒诞现实的深切感受。而且，这种荒诞感，在《邯郸梦》里较之在《南柯梦》里更为强烈，更为鲜明，可以看出在汤显祖的哲学意识中，荒诞感几乎是与日俱增的。

其次，汤显祖在“二梦”中表现了人在这个荒谬的现实中的荒诞的生存状态。人的主体性在荒诞的世界面前几乎微不足道。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做出有意义的行动，可又终日忙忙碌碌。他只是一个牵线木偶，是谁在牵线？该如何动作？将发生什么？他一无所知，但却不能不活动着。

《南柯梦》里，淳于棼违心地做上“老婆官”，本是“酣荡之人，不习政务”，居然把南柯郡治理得井井有条。以功升左丞相，本应更有所建树，孰料竟不由自主地日益腐化堕落起来，“权门贵戚，无不趋迎，乐以忘忧，夜而继日”，甚至与国嫂、郡主、皇姑花天酒地，淫乱无度。他始终不明白，他为何会从嗜酒落魄的狂徒，变为清政抚民的循吏，又沦为腐朽没落的权贵？在整个荒诞现实的制约下，他的主体能动性几乎丧失殆尽。《邯郸梦》里的卢生也同样被卷入这种不可理喻的宦海波澜中，任其飘流，任其沉浮。只要一步入仕途，他就身不由主地要去钻营贿赂，逢迎权贵，贪赃枉法，营私舞弊，倾轧构陷，穷奢极欲。这是任何人为的力量也阻挡不住的。传统的修身养性、正己治国之说，在荒诞的现实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、不堪一击。

而且，更重要的还在于，“二梦”还进一步表现出人的一生全部努力、全部追求，人所向往的一切，实际上都是毫无意义的。人在现实的生存中找不到意义，在世界上找不着归宿。他注定只

能陷入或则麻木不仁、或则迷惘痛苦的境地。等待他的唯一结局只有死亡。要超脱死亡的唯一出路，只是甩手红尘，遁入虚无。两剧都站在哲人的高度，把主人公追逐功名利禄的几十年光阴压缩为短暂的一瞬，以说明人生人世的荣华富贵，无非空幻如梦，根本不值得贪恋与追逐。人生的意义、价值、理想，一切都归于虚无。于是荒诞意识又升华为宗教意识。

在《南柯梦》里，作者认为人世间的纷争如同蚁争一般毫无意义，“众生佛无自体，一切相不真实”，“诸色皆空，万法唯识”，人们终生追求的至境只能是“万事无常，一佛圆满”。淳于棼沉梦初醒后大彻大悟：“人间君臣眷属，蝼蚁何殊？一切苦乐兴衰，南柯无二。等为梦境，何处升天？”

《邯郸梦》结尾，卢生梦觉后深深喟叹：“六十年光景，熟不的半箸黄粱！”吕洞宾片语点醒他：“都是妄想游魂，参成世界！”他才恍然大悟：“人生眷属，亦犹是耳，岂有真实相乎？其间宠辱之数，得丧之理，生死之情，尽知之矣。”于是尽扫富贵功名之念，拜吕洞宾为师，云游四方，终登仙境。

既然人生的探索追求都是徒劳无益的，于是寻找自我的真实存在就成为摆在汤显祖面前的严峻课题。在卢生和淳于棼的梦魇般的现实生涯中，汤显祖痛苦地看到了他孜孜以求的“情”一旦沦为“矫情”后，将如何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而导致人格的消失和人性的堕落。

吴梅先生指出：“《邯郸》卢生，则衿具夤缘，邀功纵敌，而俨然功臣也。”（《中国戏曲概论》）的确，汤显祖一反常规，没有以忠臣、孝子、节妇、义夫作传奇主角，而是让一个随波逐流、狡诈机变的中庸之材取代了英雄地位。卢生从小就机心叵测、行为不轨：他的钦点状元，是用钱买通皇亲贵戚得到的；他在翰林院利用兼制造职权，偷写了夫人诰命；河功成就，迎驾东巡，他不择手段地取悦“龙颜”；开边大捷，军务倥偬，他念念不忘在天山勒石纪功；缠绵病榻之际，他仍大权独揽，军国大事俱决于床前；直到弥留之际，他因小妾所生幼子尚未受封，竟久久不得咽气；

……。卢生仕途奔竞的丑态和势焰熏天的权欲，跃然纸上。但是，我们并不能因此就一笔抹煞了卢生的英雄勋劳和坎坷境遇——他作为正面人物与权奸宇文融势不两立。累建河功，又因功被诬，险些斩首云阳，终竟流窜崖州。显然，卢生是一个美丑并举、善恶兼具、悲喜共生的人物形象，在他身上杂糅着崇高的事功、悲惨的境遇与滑稽的行径、卑劣的心性，在他身上封建传统的理想人格已然不复存在了。

而《南柯梦》里的淳于棼则展现了人性堕落的历程。他善始而继之以恶终，表现了在浑浊的官场中的人格的扭曲、人性的腐蚀和灵魂的污染。这种扭曲、腐蚀和污染，既由于现实世界、客观环境的荒诞，也展示了外力作用下自我内部善恶、美丑的消长代谢——自我的荒诞。

汤显祖认为：“性无善无恶，情有之。”（《复甘义麓》）人先天秉赋之“性”是无善恶可言的，甚至可以说都是善的，所谓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；但人一旦涉足社会，由“性”而生之“情”就不可避免地有善与恶之分了。善之“情”即所谓“真情”，如《牡丹亭》里杜丽娘之情；恶之“情”即所谓“矫情”，如淳于棼、卢生之情。“真情”本源于“性”，是其正常形态；“矫情”悖逆于“性”，是其反常形态，因而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，势必导致“性”的扭曲和堕落，导致人格的毁灭和人性的荒诞。然而人一旦涉足社会，“矫情”的滋生和膨胀又是不可避免的，淳于棼和卢生不就是鲜明的例证么？人不得不涉足社会，因而只能充当自己想象中要充当的角色，而这种角色本身又是假装的，是不符合本性的。要恢复本性，只有完全泯灭“情”。

在汤显祖以前的中国文学家、哲学家并非没有荒诞意识，我们可以列出庄周、阮籍、嵇康、李贺、柳永、苏轼、关汉卿等名字来。但是汤显祖的荒诞意识如此鲜明、如此深刻，却显然是晚明的荒诞现实和精神危机的产物，是封建社会信心动摇和幻想破灭的征兆。《南柯梦》和《邯郸梦》之所以在晚明、清代历久不衰地演出，其深潜原因盖在于此。

在汤显祖生活的明神宗万历一朝里，荒谬绝伦的事情层出不穷。汤显祖屡次说“顾世局无一处非可笑，兹且日新”（《与岳石帆》）；“廊庙事，足为一叹”（《与汤霍林》）。“酒色财气”四病俱全的神宗皇帝朱翊钧，从万历十七年之后“郊庙、朝讲、召对、面议均废”，只因“挺击”案召见群臣一次。内阁大臣张居正因“夺情”风波，残酷迫害反对者，不是廷杖，就是充军。可是他死后不到两年，家产全行籍没，长子敬修被逼自杀，全家发配到烟瘴地面充军，报应竟如此之速！此外还有科举的营私舞弊，官场的倾轧构陷，士夫的沉溺声色……神圣的儒学传统遭到了无情的嘲弄和亵渎。一些思想敏锐的文人士大夫如徐渭、李贽、汤显祖者流，在脱离了熟悉的世界之后深感痛苦与恐惧，于是超越了具体的历史社会范畴，直接向人的存在本身发问，产生了像《南柯梦》与《邯郸梦》所表现的荒诞意识。

在现代西方，自从1953年贝克特的剧作《等待戈多》在法国问世以后，荒诞派戏剧曾经喧嚣一时。荒诞派戏剧着重表现一旦与客观世界脱节，人的形象本身发生的重大变化：人与世界的分离，人与生活的分离，人与传统的分离，使人茫然不知所措，失去了在世界、生活乃至“自我”中的地位。

汤显祖的荒诞意识同西方现代荒诞派戏剧家的荒诞意识相比较，有其不同的特征。第一，在人生意义上，西方戏剧家认为，人们追求超验，追求现世以外的东西，为了给现世生活以意义；但这种超验本身就不存在，故而生活本来就没有意义。如《等待戈多》一剧中，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毫无希望而又永无止境地等待戈多。汤显祖则认为，人们追求酒色财气、功名富贵等现世以内的东西，为了给现世生活以意义；但这些东西是短暂的身外之物，“人到无常万事休”，故而人生的追求毫无意义。第二，在主体特性上，西方戏剧家不写有社会存在的人，而着重选取站在存在的边缘上的人；主要表现人一旦与客观世界脱节，人也就与自己的本质疏离，失去了“自我”；表现“人类在一个荒谬的宇宙中的尴尬处境”，及其所感受到的威胁感和恐惧感；表现人与

人之间的隔绝与不可沟通。汤显祖则写有明确的社会存在的人，他只是在灵魂上飘流游荡着；主要表现人一旦涉足荒诞的现实，人性必将遭到扭曲，被“矫情”所驱遣而不由自主；表现人在荒诞现实中被动、盲目，及其所感受到的恐惧感和失落感；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、尔虞我诈。第三，在表现方式上，西方荒诞派戏剧情节本身没有内在的意义，而只是一种心理感觉的“外化”；没有完整而鲜明的人物形象；对白也全是语无伦次的，没有意义的，——要之，是以荒诞来表现荒诞。而汤显祖的戏剧则有完整的艺术形式，合乎逻辑的情节，入梦出梦的总体构思，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，和规范化的优美的语言，——要之，是用不荒诞来表现荒诞，从而显示作家与观众自身凌驾于荒诞之上，而不是自身的荒诞；显示荒诞的反常，而不是荒诞的正常。

总之，西方戏剧家的荒诞意识与汤显祖的荒诞意识虽然同样归趋于虚无，但在前者虚无的是世界、上帝乃至人自身，在对虚无的涵泳体验中寻找自我；在后者虚无的仅仅是现实、人生和人的肉体，超验的上帝和幽玄的灵魂则是真实的，是在虚无的涵泳体验中皈依上帝。淳于梦的遁入佛门与卢生的超升仙境，其意蕴正在于此。

·文史信息·

汉代的博士家法与师法

随着汉武帝建元五年(前135)立五经博士，学官由经师统治之后，两汉的官方学术教育中逐渐出现一个新现象，这就是博士家法。家法从师法分起，它的实行当在昭宣之后。武帝时，博士传授重师法，各书分立博士。他们都自称承受于师，传业“守学不失师法”。西汉重师法，非特以传师学为荣，而且其不守师法者则同门相与攻之。说有异同，分门教授，是不守师法之肇始，家法分出之趋向。从表面现象看，两汉的家法与师法都是师弟相传专主一家，但究其内容与精神，则二者尚有不同之处。即在经学系统中，师法与家法是大宗小宗、主脉流派之别，师法溯其原，家法衍其流。这是纯学术性质上的差别。其二，在博士系统中，师法与家法有官私之别，即有政治属性上的差别。朝廷立博士是立师法，守师法得立学官，否则斥黜之。

(摘自罗义俊《论汉代博士家法》，见《史林》1990年3期)

沈家本与中国近代法制

· 历史百题 ·

梁治平

正好是五十年前的今天，已故北京大学教授蔡枢衡先生写就了《中国法律之批判》一书。在这书的篇首，他写道：“三十年来的中国法和中国法的历史脱了节；和中国社会的现实也不适合。这是若干法学人士最感烦闷的所在，也是中国法史学和法哲学上待决的悬案。”（《中国法律之批判》第一页，正中书局1942年版）这一个“待决的悬案”今天解决得怎样，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，而此刻要弄清的，是这“悬案”能否成立，以及，倘若能够成立，“悬案”缘何而来。为此，我们可以由清末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先生开始。

沈家本（1840—1913），字子惇，号寄簃，浙江归安人，史家谓其“少读书，好深湛之思，于《周官》多创获”（《清史稿》卷四四三，列传二百三十）；光绪九年成进士，留刑部补官，后充主稿兼秋审处，遂专心法律之学；光绪十九年出知天津府，后授光禄卿擢刑部侍郎。光绪二十八年，沈家本受命出任修订法律大臣，至此，他的才具与抱负才得以充分地施展。

沈家本所处的时代，正是中华

民族历史上最动荡，最关键的时刻。自鸦片战争爆发，内忧外患，纷至沓来，于是有洋务运动，有戊戌变法。至其终不能成功，乃又有第二次变法。先是在光绪二十七年，两江总督刘坤一、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次会奏变法事宜，其中于法制改革一项列举颇详〔详见杨鸿烈：《中国法律思想史》（下册）第301—305页〕。然后有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六日上谕，谓“现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，着派沈家本、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，按照交涉情形，参酌各国法律，悉心考订，妥为拟议，务期中外通行，有裨治理”（《删除律例内重法折》，《寄簃文存》卷一）。考其背景，实是因为光绪二十六年以后，英、日、美、葡诸国在与中国续订的商约里面，应允待中国律例与东西各国改同一律，即放弃其在华的领事裁判权。清廷的这一次变法，因此在一开始就有了一种急功近利的政治色彩。沈家本在这种情形之下受命为修律大臣，自不能不受某种偏狭的影响。然而，他毕竟能以敏锐的心智去了解世界大势，以开明的胸怀去应和历史潮流，创为一代法学。其议论与活